去广义虚拟过度与“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

——返璞归真、清晰投入产出与振兴实体经济

萧　琛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论文反思旧常态经济制度设计出现系统偏差的理论症结,继而就公共目标校准、公共品运营定价、公私企业格局平衡、事业创新驱动模式改进和实体经济提振等五大体制层面上的“去广义虚拟过度”乃至“不再容忍腐败”等问题,探讨“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中亟待关注的改进空间和战略取向。

关键词: 广义虚拟;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投入产出;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020-08

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反四风”“四个全面”等政策转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意义深远。“唯 GDP”“土地财政”“经营城市”,乃至公共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沉疴积弊,根源都在于早先制度设计存有系统偏差。本文拟反思旧常态经济制度设计出现系统偏差的理论症结,继而就公共目标校准、企业格局平衡、事业创新驱动模式改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提振五大体制层面的“去广义虚拟过度”乃至“不再容忍腐败”等问题,探讨“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中亟待关注的改进空间和战略取向。

一、珍惜资源,民生为本,审慎权衡公共目标的“机会成本”

经济资源永远稀缺。肆意浪费和过于慷慨,必将遭受历史严惩。当年大英帝国工业过度、烟囱林立,结果空气毒坏,数以万计市民因呼吸而死亡。美国也曾不注意水土保持,结果“尘暴”(dust storm)席卷肆虐酿成巨大灾祸。

1. “唯 GDP”“土地财政”“经营城市”遗患无穷并导致公共部门膨胀

多年实践已经表明:“世界工场”“钢铁大王”“造船大王”“水泥大王”“造纸大王”“印刷电路版大王”等“美誉”接踵而至之际,正是“江河湖海污染严重”“草场山林迅速消退”“‘APEC 蓝’日渐稀罕”乃至“鱼米乡水土严重污染”等灾难纷至沓来之时。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匆忙引进(外资)项目时,一些地方官员对于资源的机会成本的慷慨程度甚至已经令人发指。

旧模式不仅让“18 亿亩耕地红线”难以守住,不仅让农民损失了 30 万亿,而且酿成了房地产的供应过度和分布畸形,房价博弈长期胶着、拖累经济。此外,经营城市和土地财政所囊入的土地转让费之巨,竟可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30%—50%! 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和许多公共部门心态膨胀、大兴土木,楼堂馆所奢靡成风,政府大楼一个比一个高大轩昂。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也扶摇直上。2013 年 6 月,总额已经高达 17.9 万亿

收稿日期:2015-03-01

作者简介:萧琛,男,江苏高邮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专项基金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X2013-1001(Z)。

① 2015 年 3 月 27 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市政分论坛上的讲话。

② 财政部长楼继伟“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市政分论坛上的讲话“1 万亿不够! 楼继伟称可能进行更多债务置换”,《华尔街见闻》2015 年 3 月 27 日。

元!①而同期国家债务也只才接近 10 万亿元。②

理论上讲,公共品供应一般都容易过度,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官僚们也都偏好公共工程。然而,在政府大楼这等明显为选民敏感之处,他们却无不谨小慎微,生怕有滥用税金不重民生之嫌,进而影响民调和选票。笔者很多年前曾参观过美国纽约市政府,规模偏小设施陈旧自不必说,令人吃惊的是大楼过道墙面上竟有许多裂纹,少数地图状斑块堪比破庙残壁。低调竟至装穷哭穷!

2. 张扬显摆和轰动夺目的背后是放纵“造租寻租”和“灰色预算”

不妨考察一下旧常态下遍布全国的“面子工程”。共同负面特征好像都有点张扬显摆、标新立异和华而不实。许多建筑,单从力学角度看恐怕就令人悬心,建筑学专家也多有摇头和感叹。值得反思的是:建筑造型追求背后的社会文化潜意识是否同旧常态官场文化乃至利益集团有某种必然联系?中国无疑不缺设计人才,但设计者必须向公共品决策人投其所好,否则便不能人尽其才脱颖而出。

从政治角度看,追求政绩的冲动势必导致官员偏好显摆张扬和华而不实。看得见的地面上的建筑鳞次栉比令人称奇,可看不见的地底下的污水网管却问题成堆,乃至整个城市逢雨必涝。从经济角度看,标新立异和轰动夺目则势必加大成本匡算难度,更容易放纵“灰色预算”和“造租寻租”。“重大赛事之后必倒下一批官员”,这个魔咒难道不是如影随形?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写道:我坐在鸟巢上,问:哪里是发展中国家,答:是我们美国。言下之意是:你们中国应该已经是很发达的经济体。对此,我们的确不无理由自豪,但是否也应该更积极地体味其弦外之音呢?

3. 民生为本、物尽其用,更应成为新常态经济中公共目标的首要追求

经济适用、物尽其用,通常情况下都应首先推崇,尤其是在经济还不那么发达的时候。18 年前,泰国曼谷新建成了一座全新的亚运村,主人自豪地告诉我们,赛后它将是一所重点大学的新校园。笔者听了良久无语。美国的“五角大楼”造型也算独特,但却为的是让对手更难把握大楼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电视上常出现的日本国防部大楼,也许特别的陈旧、矮小和土气,但是否属别有用心,如此装潢出侵略性不强的外表呢?

民生为本至为重要。没有民生改善,就没有消费兴旺,也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渔船渔网越多,捕鱼能力越强,越要求买鱼吃鱼的能力增强,否则所捕的鱼就会烂掉。这就是经济危机最朴素的表达。在马克思《资本论》那里,是“工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在凯恩斯的《通论》那里,则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中国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长期没有超过 1/2,而发达国通常是 2/3。

新常态中,关注民生放水养鱼已经刻不容缓。革命老区坎坷泥泞的小路,穷乡僻壤的缺医少药,贫困山沟惊险悬心的高架竹桥,“猪圈里的小学生教室”,无疑都亟待给予更多关注。近年震灾伤亡报道中,中小学生等弱势群体竟然占到非常高的比重,令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惶惑不解。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孩子们代表未来,按法规校舍必须修建得特别抗震,偷工减料罪莫大焉。

二、杜绝“害品”、倡扬“益品”,矫正公共品定价的“非效率”倾向

公共品供应不仅规模容易过度,而且在管理运营上也容易出现各种非效率。

1. 见贤思齐、不再轻易追求“无与伦比”,而应当保证每一笔公共支出的效益

2009 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拉开了跨进低碳经济新时代的大幕。主题重大意义深远,但会场设计却极其简陋和低调。入口处塑有两座冰雕,造型分别是非洲马赛族的男女勇士。代表进场时,冰雕栩栩如生、衣折清晰可辨;而在离场时,则只见冰雕在暖空气中逐渐模糊不再成形。由此艺术地传递出一个信息:高碳经济和“全球气候变暖”正在给人类带来灾难。

反观我们自己,重大赛事的开幕式是否一个

比一个更加无与伦比?应否继续不计成本地加以追求?近年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应该说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改进。在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古都南京的魅力等方面,应该说都有刻意的追求和不俗的表现。尽管赛后其高官最终也没能逃脱前文所说的“魔咒”。

2. 抑制“害品”、反思抽象负责,尽快消除公共品生产使用维护中的隐患

“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修光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需要杜绝的是,让马路反复开膛破肚,今天埋根电话线,明天埋根光缆,后天再检查维修,没完没了,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这种草菅工程不计浪费的行径,早已为路人和漫画家们讥讽为“拉练马路”。背后命题则是:设计者和拍板者为什么如此不计成本?什么在导致公共工程决策人如此鼠目寸光?应否进一步明确责任账户和开征相应税种?如“工程追责”“渎职罪”“扰民税”“环保税”等。

北京前几年“721 特大自然灾害”中,市内广渠门桥下沉式立交桥下的公路积水曾深至 4 米,导致一名年轻人被水淹闷死在自己的车内,引起全社会震动。其实,在那以前的两年,同一桥下的积水就曾经深达 2.5 米!当时曾有个段子:“我平生最浪漫的事,就是领着你到北京来看海。”然而这些预警信息却并未得到公共部门的足够重视,直至两年后出了人命,市委领导才出面道歉。其实,具体的设计者、拍板者、维修者的问责机制也许更为重要。相关机制是否一直乌有或形同虚设?责任必须落实到人,集体负责、模糊负责、抽象负责,往往都是要误大事的!

3. 通信、交通、医疗、教育等“益品”,应尽可能低价免费,而不应大反其道

就公共品定价而言,不合理的收费也会导致使用不足或使用过度等问题。

不妨先以高速公路收费为例。理论上讲,在车多时应当实行高收费以便分流,而在车少时则应实行低价以鼓励多用。然而旧常态下我们却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典型的事件是“黄金假全国高速免费”,理应控制流量时却完全自由放任!表面看似乎皆大欢喜,事实上却创下了无数个怨声载道的纪录,尽管 GDP 倒是很快被拉上。

再如,(移动)互联网的收费模式也很欠考虑,严重抑制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等活动。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似乎都首先成为相应部门大幅涨价的理由。“4G 并不很贵,打一个晚上也就是用你那座房子缴费就够了!”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但真实情况却是:中国游人所到之处,必先习惯性地发问“有 Wi-Fi(流量免费)没有”,这恐怕应已闻名国际。

公共品中的“益品”(merit goods)的生产和经营,无疑应仰仗政府。所谓的“益品”,指的是社会经济需要多多益善的那些商品和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和通信等基础性服务。“益品”当然不一定全由公共部门提供,私立学校、私立医院海外比比皆是。但政府从来不曾也不应袖手旁观,而总是通过政策、补助和税收等手段予以补偿和保障。鉴于“益品”的事业性和普惠性都很强,发达国通常都实行低价甚至酌情免费的政策。

我国的情况属例外。例如,我们的电话费就长期偏高:从香港打到北京竟然要比打到纽约还要贵 10 倍(曾经的极端)!又如,我们的汽油价格也比美国贵,尽管工资水平仅为他们的 1/10 不到。再如,苹果电脑一般说来更依赖全球(不仅是国内)网络和谷歌(不仅只是百度)引擎,因而在国内许多场合就很容易受挫,非常误事。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大多数场合互联网出国都不(容易)免费,有的甚至收得非常狠。这一点也常让国际友人费解:就这样,也想追赶工业 4.0?

此外,高速公路、孩子教育等收费也都明显高出,更不用说高得离谱的都城房价。不仅让年轻创业者脱一层皮,而且也让其父母的养老金不得安宁,非常地不人道和欠担当。而就在与我们毗邻的小国新加坡那里,安居性的“非商品房”的比重就能高达 80% 以上!决不让年轻人刚毕业就有压力,等未来创业成功了再买不迟。可见,被新加坡人称为“国父”李光耀的政治功德绝非浪得虚名!

“创业者有其屋”这一点,至少一半意义上应该属于城市的“公共品”。庶民安居乐业,政府有

关部门当然责无旁贷!然而在旧常态下,尽管1998 年《国 23 条》曾将“经适房”“廉租房”和“商品房”的供应比例依次定为 80%、10%和 10%,但到 2003 年《国 18 条》则又修改成了 0%、10%和 90%!①

三、简政放权、国企“深改”,有效削减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

我国国有企业涵盖面很广,包括公共经济、天然垄断行业(煤电水、石油、电话、网络),以及稳定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如银行、证券、交通和战略资源经营等。此外,还包括很多事业单位,如教育、医疗、社保等。

1. 高度关注与尽快改观公私经济投入产出格局严重不对称的问题

公私经济比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本应有不同的“黄金分割”。美国的公共部门比重比欧洲就要明显低很多,公私比例的变动也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容易大起大落。中国的情况不同。由于计划转轨经济的历史遗留,我国公共经济的比重早已显著偏高,国有企业的行政属性也显著偏强。

就要素资源的直接支配而言,粗略地说,大约 3/4 都为国有企业所掌控,而只有 1/4 才为民营企业所掌控。而我们的对手日本却正好相反。②美国的情况是公私经济大约是各占半壁江山。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我国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高,可达 9%左右,而国有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仅为 4%左右;两者相比,民企比国企要高一倍以上;加上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和大众创业等改革红利,我国民营企业所能贡献的产值比重已可高达 GDP 的 3/4!

2. 推进民营新政、简政放权、大众创业,让民营企业能够平等参与竞争

公私经济的投入格局和产出格局的严重不对称,意味着民营企业必须从国有企业转移资源要素。途径很多,包括购买、外包和合作经营等。

投入产出格局不对称,还意味着民营企业获得资源要素的交易成本,势必要比国有企业高出许多。且不说中小企业长期贷款难、贷款贵,也不说资本市场 IPO 各环节中小企业普遍劣势望洋兴叹等,单是拿到经营性外包合同或其他合作协议,各种钱权交换、灰色交易等负面行径,恐怕都很难避免。代价之高,不难推算。

旧常态下,豪华酒店目不暇接,公款消费肆意泛滥,“老虎”“苍蝇”不计其数,等等,某个角度看都是“交易成本”高昂的写照。动态地看,国企高官城府深沉、偏好很难揭示,“造租”“寻租”花样翻新,“潜规则”“后规则”普遍流行,加之“朝令夕改”和“代理人频繁更替”等,势必导致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畸高不下,愈演愈烈。

几年来总理大力推进民营新政的初衷,就在于打破资源垄断和权力寻租,以便让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竞争。《新 36 条》《42 项细则》等重大改革颁布之后,民营企业的作为空间已经得到空前拓展。近年采用了注册制和做市商制的“新三版”,也为中小民营企业竞争创业大助了一臂之力。

但是,国有企业的“玻璃门”“弹簧门”“请喝酒不设座”“门好进、话好听,就是不办事”乃至“鸿门宴”等,应该说仍然屡见不鲜很难改观,以至于许多民营企业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忧心忡忡、裹足不前。这也是总理推行“大众创业”“草根创业”,并大声棒喝“做官不作为”的现实注脚。

3. 审慎采行“负面清单”“混合所有制”“IPO 注册制”,促进国有企业“深改”

与民营新政一样,“国企深改”也意义深远。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曾经历两轮改革,其一是转换经营机制;其二是资产多元化(IPO 上市等)。新一轮改革则包括“负面清单”和“混合所有制”等。就产能突围而言,“一路一带”和“亚洲投资

① 可参阅作者:《论中国房地产的奇迹、泡沫与调控困境 — 广义虚拟经济的过度、失衡与治理》一文,《澳门理工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5—17 页。

② 经济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中日现代化差距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在明治中后期果断地放弃国有企业,而让三菱、三井等私人接管。

银行”正在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为国企深改创造更好的氛围。

“负面清单”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如果说过去的“正面清单”(放权分权)是告诉企业能做什么,则现在应该是,除了写明的不能做的几项,其余的都可以自行处理甚至先斩后奏。权力清单的另一面是责任清单,二者相辅相成。目前,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大自贸区都正在奋勇开拓。应该说,“分权升格”势将成倍地释放制度红利。

“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意图,从外部合作角度理解,应该是让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尽可能地释放,以便更有效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从内部管理角度理解,则应是更好地解决国企高管和经理员工的激励问题。“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可谓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也即“公私经济伙伴关系”。与前两轮改革不同,PPP 鼓励国企在产权交易这个更深层次上与民企等社会资本广泛地展开合作。也即,不仅合作经营,而且共同拥有。

就外在表现而言,它已在呼唤以国企为主导的实质性的相互持股的企业集团。就内部组织而言,私人入股、企业期权等激励势将应运而生,进而提升高管和员工的积极性。长远看,这势将有助于消除国有上市企业的“模拟股份制”的属性,进而实质性地促进 IPO 注册制改革到位,乃至未来资本市场的演进和嬗变,让(资本)市场因素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这个小平时代就已经提出的战略任务一直难以到位的前提下,对“国企深改”的难度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世纪之交前夕,国企“高层买断”问题曾浮出水面,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曾酿成一场白热化的论战。尽管如此,深水区的改革攻坚,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应该是必胜的。可以预期,在注册制改革到位之后,民营企业的融资劣势应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对国企深改的倒逼能力也势必显著增强。

四、优化人才激励、质疑“行政驱动创新”,让事业更像事业

企业改革任重道远,事业改革也非一蹴而就。有效的创新势必要求人才激励机制优化到位。旧常态下广义虚拟、容忍腐败的增长模式和各种钱权交换行径,已经造成了事业企业界限的模糊,事业型人才激励机制已经被严重扭曲。一方面是“企业办社会”,另一方面则又是“事业产业化”。

改革初衷都无可非议,加速科研能力转化等,无不义正辞严。但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却并没有对此加以支撑。事实是:科研、教育、媒体等事业单位的正常秩序都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干扰、冲击和腐蚀。招生名额和入学门槛成了“造租”“寻租”的手段,宁静的校园里人头攒动,名牌轿车扎堆,很难再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大牛市中,科研院所也曾被三令五申,要求上班不得炒股。

1. 事业产业化要求重创收和轻创新,导致“资源错配”和“人才扭曲”

“产业化”所偏好的是“经营性人才”而非“科研型人才”①。创收能力不强或经营心理勉强的事业型骨干,通常很难被(继续)放在行政岗位上,进而演成权力偏好对象发生系统性错位。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常见的做法都是权力资源优先被配置在“创收经营实体”上,而只能留下少得可怜的资源放在“教学科研虚体”上。然而恰恰是这些虚体却始终在干生产性的实事。

“配置错位”难免导致“人才转向”,一大批有前途的科研教学尖子,都(很难不)去搞点行政,开始是“双肩挑”,后来部分人完全脱离专业。而就那些坚持做科研的事业型人才而言,往往也会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如项目经费匮乏等)而很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年轻的学生们也不能例外。发达国高校毕业生报考“文官”的比例一般不过5%—10%,而我们则竟然可以超过50%!

① 极端例子如作家徐迟笔下的陈景润,就是典型可爱的书呆子。

2. “将帅异化”势必导致“规则扭曲”,进而影响“人才激励”和“创新效率”

旧常态下,事业单位人才所竞争的主要是技术职称、行政权力、科研经费和荣誉奖励等。实践表明,竞争成功关键往往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鉴于规则通常只能取决于相应行政主体,因而博弈胜者也自然很容易属于那些处于权力岗位上的(经营型)人才,而很难是缺少规则影响力的科研型人才,尤其是“重点”或“重大”项目。

通常情况下,评选标准(包括确定委员和表决方式等)被确定之后,将被遴选出的“优胜者”或曰“中标人”也就不难推定。在很多场合,所评选的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项目本身”而是“项目主持人”。这个“潜规则”已经成了知情者的共识和投票者的默契。“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①

就非权力主体而言,事业产业化的结果则是:教师、大夫和专家的精力很容易发生转向,诸如去争取科研经费和走穴机会等。否则,高企的房价、孩子教育等现实负担,恐怕就更容易让他们很有限的正规工资相形见绌。天才的创造火焰也未必不需要利益燃料。

3. 反思“项目制”、质疑“行政驱动创新”,促进学术市场尽快形成

首先,行政驱动创新模式通常只能严格管理创新链条的上游(经费投入阶段),而很难掌控好它的下游(创新产品的认定和推广),而这显然是舍本求末。无奈的深层原因在于一个法治的“专业学术技术筛选市场”的缺位。否则相当程度上可以按所产出的“创新品”的质量来进行事后的激励,类似普遍传承至今的专利制度。但若真这样效仿,则相应行政主管的权力空间将大为收窄。

其次,“创新”的失败率本应很高(666 就曾失败过 665 次),但行政(审批)恐怕就很难输得起。其结果只能是容易“将错就错”和“严进宽出”。再者,即使有能力在上游把关,行政出面也会有失偏颇。众所周知,“创新”在被产出之前,通常都只能是“画鬼”而非“画人”。然而,项目申报却难免千篇一律地要求过多的细节。期前成果、攻关团队、预计成果、中间成果等等,都必须事无巨细无限逼真。不妨打个比方:媳妇还没有受孕,婆婆就要看未来孩子的五官和四肢。更荒唐的是,婆婆(在中游监控环节)还要求每隔一段时间便将胚胎宝宝拿出来验看一下。如此几进几出,新生儿焉能茁壮?

最后,这种模式还势必会腐蚀相应的行政主管和专家学者的灵魂。旧常态下,这类丑闻在媒体上曝光的事件已经司空见惯。责怪个人不如反思并改革制度。

4. 返璞归真、走向极简、分流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事业和企业的分工本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事业让人成名成家、流芳千古,企业则让人独尊一方、自由任性。平衡二者的纽带则是“企业金钱捐助”和“事业资助基金”,基本手段则是采行“现代累进所得税”和《企业赞助法》。

若无企业事业分工,则人类追求“金钱”的动力和追求“名利”的动力将无从分流,只能被捆绑在同一目标之上。而人类长期实践已经表明:“世间有两种爱好对人间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野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之中任何一爱就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才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把两者在同一目标上联成一体,那它们就会对许多人产生最猛烈的影响。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带来荣誉,又会带来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谋取这样一个位置。这些人将投身阴谋诡计、百般争夺、结党营

① 邓华宁、俞俭、许祖华、赵孟卓、丁静、杨宁、吴晶晶:《科研经费七成按行政级别分配,权大钱多成惯例》,《经济参考报》2015 年 3 月 25 日。

私、不顾廉耻来得到这样一种名利双收的位置”①。

新常态下,返璞归真、走向极简,重新明确分工和定位事业和企业,让事业企业相互支持相辅相成,应是历史潮流所向。核心途径包括:让民间学会行会更加相对独立公正,“先规则/显规则”必须取代“后规则/潜规则”,“合作诚信资源”必须得到系统审慎的管理。“大数据”已经为世界带来了福音。一时一事容易蒙混,一生一世恐怕就非常困难。

五、抑制分配性努力、释放人才红利,致力于强大的实体经济

1. 坚持自主创新、净化合作信誉,振兴实体经济和制造业

尽管半年来的“大牛市”气势如虹,但“虚拟经济风风火火而实体经济却冷冷清清”的困境却并未能够走出。新近预测的未来 5 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 5%。②在短暂回升之后,3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再度回荣枯线以下,并创下 11 个月以来的新低。③

旧常态下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场,“中国制造”至少在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方面还是很有比较优势的。但是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现在都已走向反面,而人才红利和制度红利却来不及跟进与补位。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不振,当然是投资不当、消费不力、出口不利乃至货币供应过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制造业(尤其是上游研发阶段的)效率低下:自主创新不力、劳动生产率不高、人才激励不当、合作信誉很差等。

2. 识破对手的技术封锁和战略误导,让中国经济机体“多长肌肉少长肥肉”

多年来我们一直忙碌于自豪于房地产奇迹,殊不知其科技含量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却都非常有限。近年来,我们又忙碌于自豪于“互联网金融”,其实也不应当视为神话,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若没有“互联网 +”那个加号后面的内容,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④、德国的工业 4.0、新能源、新物流、智能文化教育(ICE)产业等,则互联网也只能体现在“淘宝”“快滴”“大众点评”“春节红包”等消费层次上,并不能实质性地提升劳动生产率并导致实体经济蛋糕迅速增大。

我们热衷的产业,简单地比喻,多数还是让经济机体“长肥肉”而不是“长肌肉”。就狙击赶超者而言,唱空中国的国际势力早就对我们进行了多种技术封锁和战略误导。对于他们的战略心机,新常态经济无疑应保持清醒的认识。2005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曾号召“自主创新”,战略眼光无疑出色。但是 10 年来的创新成就却很难尽如人意。原因是否在于前文质疑过的“行政驱动创新模式”?

3. 清晰投入产出、提升全局理性,让物流线流得到诚信流的支撑

为什么我们只能长期徘徊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原因不仅在于转轨经济青黄不接,而且还同亚细亚文化的传统弱点深刻相关。“投入产出模糊”和“局部理性而全局不理性”,是马克思·韦伯关于亚细亚文化负面特征的著名论断。

前一个特点,在广义虚拟、容忍腐败的制度设计中已经充分展现,“扭曲”“错位”“集体负责”

---

① 避雷针发明者、美国制宪会议上革命元老中年龄最大的科学家、哲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制宪会议上特地提出了这条意见,明确地要求把升官与发财分开。见曹德谦编译:《升官发财必须分开:富兰克林的忠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参考》1985 年第 5 期,第 57 页。

② 2015 年 3 月 2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中国经济新常态”分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预测:“未来 5 年中国 GDP 不能低于 5%”。

③ 汇丰 2015 年 3 月底发布的数据。

④ 2014 年,美国的英特尔、微软、AT&T 等大公司联合发起的工业互联网,包括 5 个行业、9 个平台。5 大行业是电力、能源、交通、医疗、工业。预计能创造 15 万亿美元产值,也即再造一个美国。

“责任账户模糊”,不一而足。后一个特点,则在我们现阶段的人脉合作网络中暴露无遗。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国人已经陷入了一种“互害模式”!这当属耸人听闻,但还是不妨多反省一下为宜。

“假冒伪劣”“婴儿第一口奶”“三鹿事件”“开胸验肺”“过度医疗”“教育腐败”“垃圾邮件”“干扰电话”等,都是旧常态经济挥之不去的幽灵。背后不仅有不顾信誉、以邻为壑的恶性动机和强烈的分配性努力,而且还有“局部理性而全局不理性”的潜在文化缺陷。

文化反思不够,信誉净化不到位,奖惩机制不合理,后果一定是分配性努力的猖獗,“能干的不如会干的,会干的不如会说的”。长此以往,则谁还能埋头实业和潜心事业?生产性努力又怎能得到有效激励?劳动生产率从而制造业实体经济又如何能够振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大人才大智慧绝不缺少。但不妨还应有自知之明:在平均的素质信誉、合作效率和整体协作能力等方面,应该说我们现在还的确存有差距。我们的科技大军可谓非常强势,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但却只能无奈地听任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国品牌轿车。因为,汽车的四个轮子上所载的实际上是整个的世界工业社会。每个零部件无不是众多的信誉稳定、质量可靠、供应及时的全球厂商们精诚协作和默契配合的结晶,尤其是在“互联网 +”的崭新的时代。

Get Rid of Excessiv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the Designing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Mechanism
——Expose to Truth, Clear the Input and Output,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Xiao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Reflecting the theoretical root cause of the systematical deviation embodied in the designing of the old normal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tting rid of the excessiv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no longer to tolerate the corruption appea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s in turn of the five system levels that is rectifying the public target, operating and pricing public goods, balancing the state owner enterprises and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mproving the career innovation drive mod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Then it reveals the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for the designing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mechanism.

Key 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 new normal economy, designing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put and output, the real economy

(责任编辑　　管　琴)